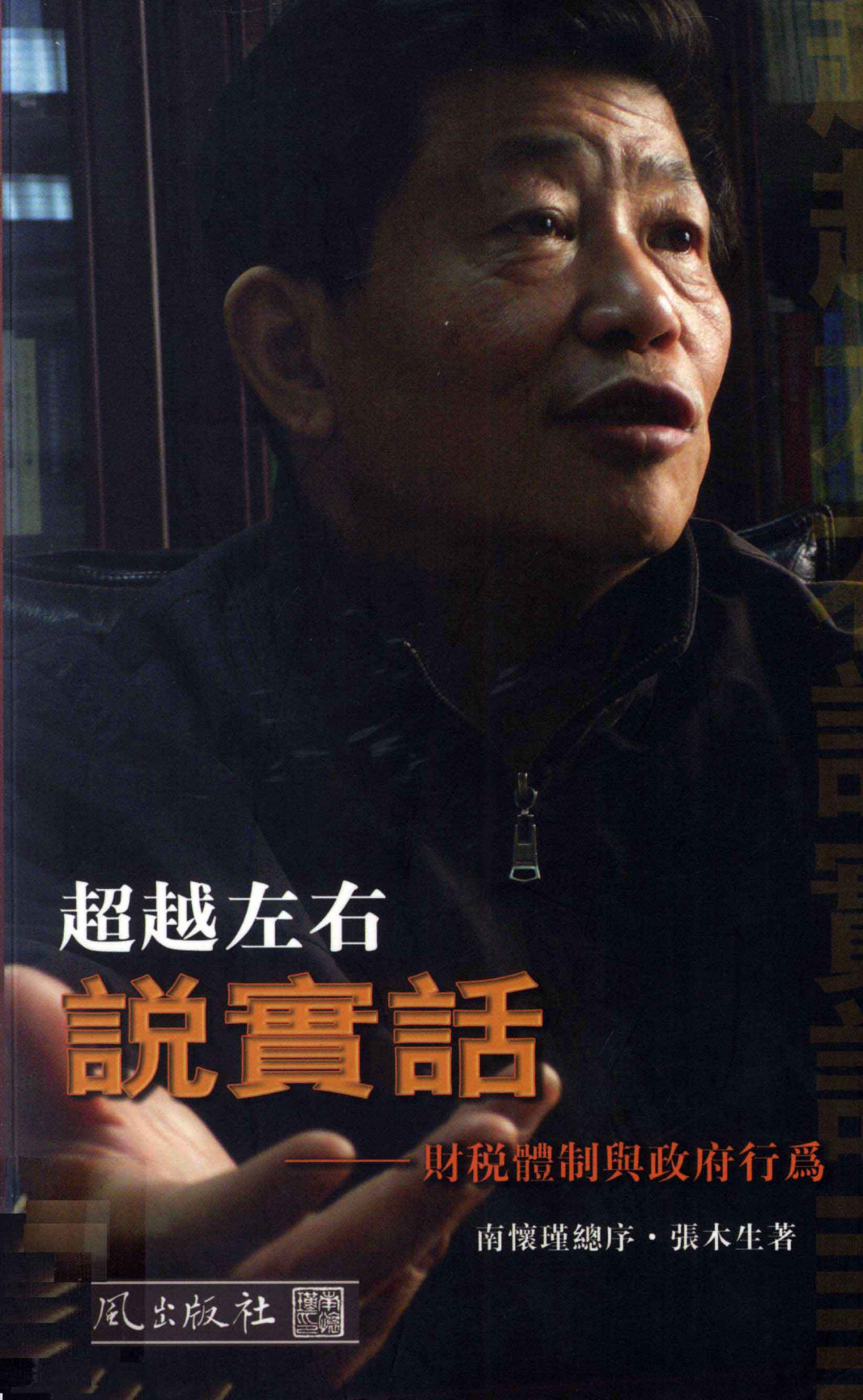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超越左右 說實話

—— 財稅體制與政府行為

南懷瑾總序・張木生著

風出版社



桑尼研究系列

超越左右說實話

——財稅體制與政府行為

南懷瑾總序・張木生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大風出版社



超越左右說實話

——財稅體制與政府行為

系 列：桑尼研究

作 者：張木生

編 輯：舒欣蓓 孟予佳

美術設計：程受琦 廖 煒

出 版：大風出版社

香港薄扶林置富道 11 號 3 樓 A 座

電話：(852) 2550 8911 傳真：(852) 2550 8711

網址：<http://www.strongwind.com.hk>

印 刷：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國際書號：ISBN 978-988-98078-7-0

出版日期：2007 年 2 月第一版

定 價：港幣 68 元 新臺幣 290 元

香港總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
臺灣總發行：聯合出版有限公司

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42-3 號 4 樓

電話：(02) 2218 0345 傳真：(02) 8667 5054

新加坡總發行：商務印書館（新）有限公司

211 Henderson Road #05-4, Henderson Ind. Park, Singapore 159552

Tel: (65) 62783535 Fax: (65) 62786300

©大風出版社 2007

Strong Wind Press 2007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(Printed in Hong Kong)

總序



自從二次大戰以來，世界上發生了太多的變化，國際間交往更趨頻繁，相互競爭牽制。先是猶太人戰後在中東地區建立以色列國，後來發展成嚴重的中東問題。二戰後，非洲的殖民地國家，都脫離了白人的統治，宣告獨立自由了，祇不過，自由卻帶給他們貧窮疾病，和更多的問題。

歐洲在二戰時受創極重，經濟上困難尤甚，有遠見者不久即開始研究整合歐洲及歐元的發行。由於美國參加作戰，美國富有，美國出頭了，語言文化也隨之而來。好萊塢的電影，美式牛仔褲及速食，逐漸風行全球。傳統以法文為國際契約的習慣，也漸漸用美式英語取代了。

亞洲受美國的影響更大，佔領日本，改造日本，韓戰越戰，美國試圖掌控全世界。

戰後科學的進步和新發明，如電視電腦

的普遍化，民用航空的發展進步，使地球上的國家都成為緊鄰。醫藥的大幅改進，人口的增長，使競爭更加激烈。加上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，核子武器的發明，造成國際間的互動更為複雜。

不論世界如何發展和變化，關係人們存在和生活的，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經濟問題。

中國在閉關二十多年後，終於開門面對世界。中國的發展改變了與其他各國的關係，國際的平衡也產生更多的變數。在自我奮鬥和發展的過程中，中國遭逢的問題，較之其他國家更加複雜。它目睹了蘇聯共產制度解體，面對自身文化的何去何從，以及經濟制度的方向等等嚴重問題。

在各種嚴苛的挑戰下，中華民族，像以往一樣，總有許多知識分子，懷抱為祖國打拚的熱情，運用智慧，研究問題，提出分析見解，扮演著智庫的角色。

在這些知識分子之中，有一個名叫王小強的學者，多年來投身研究工作，發掘問題，提出解決方案。

在一九九三年春季，老友許鳴真先生自北京來香港相敘，同來攜有王小強君，許老特意介紹，慎重託付，望予照顧指引云云。

我見小強，挺拔強項，大有不合流俗的器識，儼然一士諤諤的風格。但世俗中豈可或少這樣一類特立獨行的人物，當下便欣然接納。

小強從一九七九年開始，投身中國改革的調查研究。一九八九年赴美，先後就讀於克羅拉多州立大學經濟研究所，以及匹茲堡大學公共管理及國際事務碩士研究班，以後再赴英國，在劍橋大學得到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。

小強對經濟問題有深入的研究。經濟問題因各國文化背景不同，時代不同，實行起來各自有別。人們都知道美國自稱為民主國家，但是，早有學者及有識之士指出，民主是一種救時的方劑，正如莊子所謂：「仁義者，先王之蘧廬，可

以一宿，不可以久處也。」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，祇能適用於自己本國，輸出到別國就會水土不服而變調。經濟政策也是如此，各國只能依照自身的特點，調整適合自己的經濟政策。

小強後在香港的大學和機構繼續研究工作，並成立桑尼研究公司。他全力以赴，孜孜不倦，他的文章和著作，發表於中外許多雜誌和文獻中，現在經過整理彙集，陸續印行出版。在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，有《再造一個香港》，《「文明衝突」的背後》，《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》，還有其他人物不同角度的探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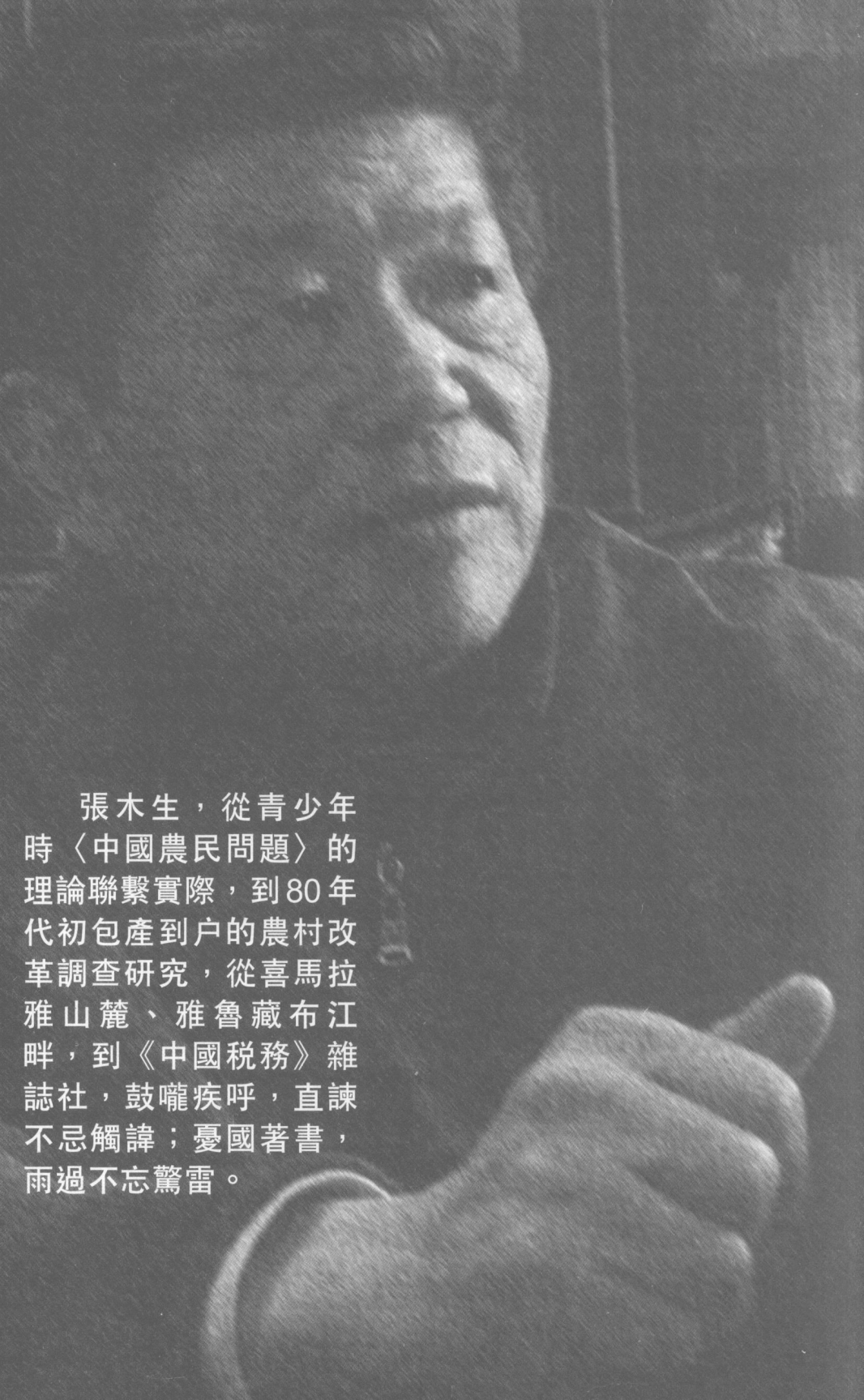
小強的文章言論每有意氣。其實，一個有抱負的青年，有感而發，大多有這份的習氣。這正如宋儒辛稼軒所說的：「昔越王見怒蛙而式之，曰：是猶有氣。蓋人而有氣，然後可論天下事。」以此觀之，亦可為之展頤了。

近年來，小強留港時間較久，對香港各方面都加深了認識，希望香港能更加進步，生活美好。尤為難能可貴者，小強自從由歐美歸來，除政治經濟問題外，也著力於中華歷史文化方面的研討。融合東西文化，視野廣闊了，他鍥而不捨地努力，提出所知所見，目的無他，企能引起更多學術討論，共同為國家社會的進步貢獻心力。

小強嘗謂，學術非為一己之私，各家見解雖有不同，但經過論辯，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。

古人云：「道並行而不悖」，見仁見智，互擅勝籌，匯合各方主觀，相互容納，即為集思廣益。今值桑尼系列書籍出版之際，特為之序，有鼓勵也有鞭策，並致祝賀之忱。

南懷瑾 於香港
二〇〇四年八月



張木生，從青少年時〈中國農民問題〉的理論聯繫實際，到80年代初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調查研究，從喜馬拉雅山麓、雅魯藏布江畔，到《中國稅務》雜誌社，鼓嚨疾呼，直諫不忌觸諱；憂國著書，雨過不忘驚雷。

序言

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

劉 源

起初，還是杜潤生杜老講的：內地人到西藏工作，最好要與軍隊建立可靠的聯繫，不僅為了物質文化和社會安全的需要，更由於在那裡，軍隊有較高的保障效率。我從河南調入的武警水電部隊，正巧在西藏承建幾座水電站。因此，杜老電令我，護送張木生。

對張木生，我並不陌生。1965年，在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前三年，他就為理想而到農村插隊，是最早用親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論聯繫實際的人，算最初以獨立苦思的方法來探尋社會主義道路的先行者之一。文化革命初期，張木生遐邇聞名，一篇〈中國農民問題——關於社會主義體制的研究〉長文，以多種手抄本的形式四處流傳。當時，農村「一大二公」，貧窮落後，不少百姓餓飯。他用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面對實際，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，引發讀者的思索，而這倒霉蛋兒自己則背上「小反革命」罪狀，付出坐「大牢」的代價。文化革命結束，張木生從內蒙基層回來，參與組建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，發動滁縣包產到戶大調查，參加前幾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「一號文件」的起草討論，以「馬列槍法純熟」著稱圈內……我在河南任鄉、縣長時，受聘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，對張木生，本來久仰其名，

有機會接觸，更是欽慕其才。他黃鐘，我瓦甕，杜老不挑不棄，統統劃拉到麾下，認作弟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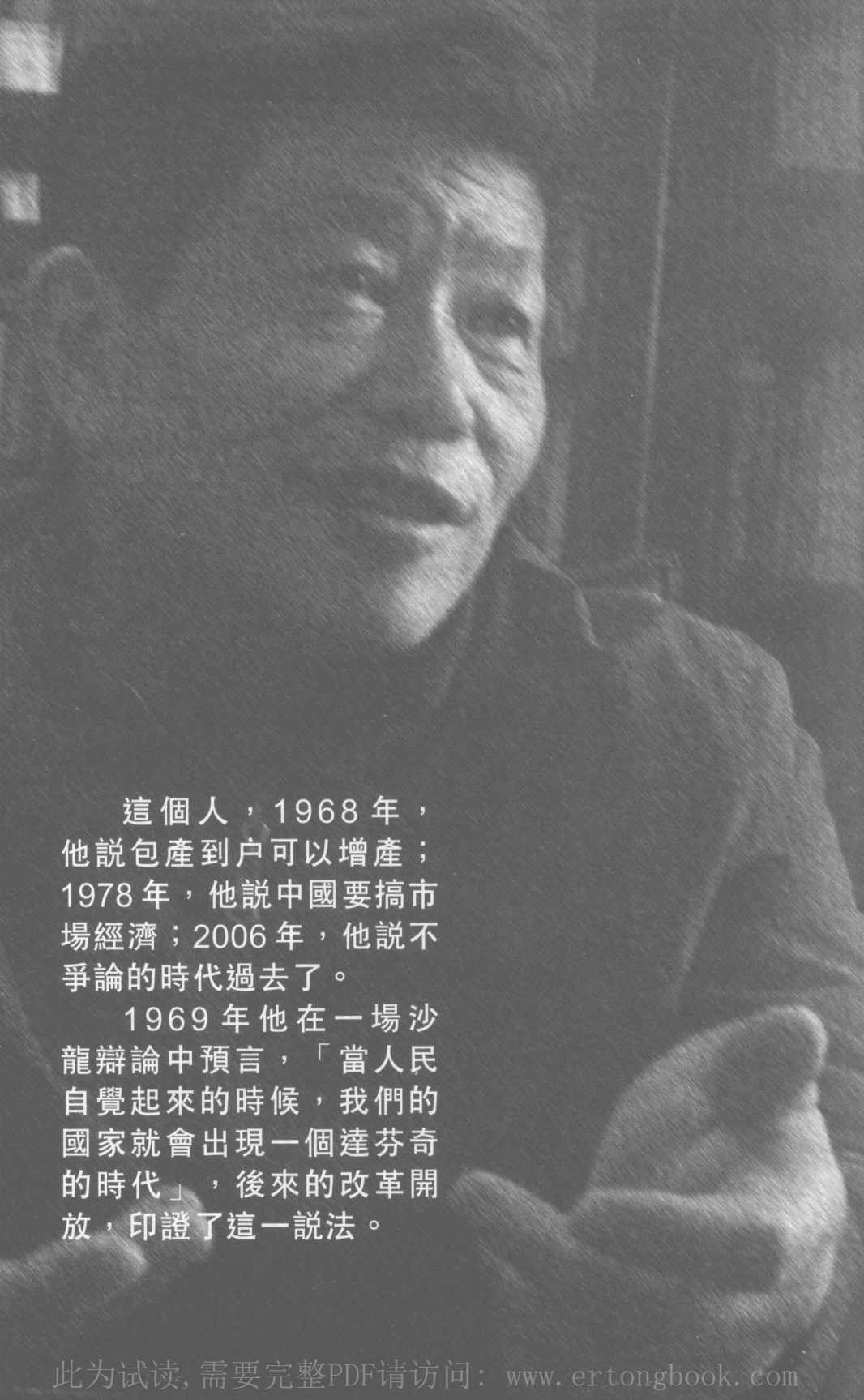
遵師囑，我引張木生入藏。在拉薩，溝通一圈兒，結識一片。出拉薩，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書記，還未到職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區專員。馬不停蹄，我迅即陪張木生趕往八一鎮。密切的交往，就始於1993年的那個夏天，兩個一心想幹點事情的北京人，遠在祖國西南邊陲，不懼艱苦環境，談工作，談學習，談理論，談人生，同輦促膝，不舍晝夜，被世上最為壯麗的美景震撼，拼胸中幾近極限的耐力抗爭……兩年後，因為種種複雜曲折，張木生掛冠而去，回京接手中國稅務雜誌社，幾年就把一個欠了一屁股債，連買紙錢都拿不出來的雜誌，辦成全國最大的財經期刊。然而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，張木生堅持共產黨員的初衷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，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思索，一刻也沒有停止。正可謂，時居廟堂，不愧忠智之士；或處江湖，常懷赤子之情。這本小冊子，集中了他近年來從財稅制度角度對政府行為的探討。

中華民族的振興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，無論說起來有多麼複雜，實踐起來有多麼曲折，為人民服務，為多數人服務，是共產黨奪取政權、掌握政權的唯一檢驗。實踐必須腳踏實地。從稅務雜誌到財稅體制，到政府執政為民，見微知著。在北京，我們有的是機會，常紮堆兒神侃。或許是熟不拘禮、憨癡無恭，最簡約地概括張木生的觀點，我祇用兩句玩笑話：站穩義和團立場，不當亡國奴，不受二茬罪；走定八國聯軍道路，不忘獄中志，不變強國心。在他那裡，仿佛並沒有要麼投靠八國聯軍，要麼選擇義和團的「兩難」；更沒有已是滿眼球的酸文腐語、裝洋耍酷。他呼喊的，是實

打實的制度建設，而不是嘩眾取寵的政治口號；他高明的，是超出「新左」、「老右」，越過「主流」、「非主流」，回到老祖宗那裡，察起點、定基點；對照新時代這廂，先搞清、再搞定。中國士大夫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，放在哪裡，都有豐富多彩的大學問。

張木生，從青少年時〈中國農民問題〉的理論聯繫實際，到80年代初包產到戶的農村改革調查研究，從喜馬拉雅山麓、雅魯藏布江畔，到《中國稅務》雜誌社，鼓嚨疾呼，直諫不忌觸諱；憂國著書，雨過不忘驚雷。有官沒官，官大官小，共產黨員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，本職工作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探索，一脈相傳，矢志不移！

2007年1月1日



這個人，1968年，他說包產到戶可以增產；1978年，他說中國要搞市場經濟；2006年，他說不爭論的時代過去了。

1969年他在一場沙龍辯論中預言，「當人民自覺起來的時候，我們的國家就會出現一個達芬奇的時代」，後來的改革開放，印證了這一說法。

對話張木生

尋找我們的「達芬奇時代」

陽 敏

這個人，1968年，他說包產到戶可以增產；1978年，他說中國要搞市場經濟；2006年，他說不爭論的時代過去了。

張木生，1980年代初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，跟隨杜潤生先生共同參與農村改革開放的設計，現為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。

早在1968年，他就寫出了流傳甚廣的〈中國農民問題學習〉，在知青中間颳起了一陣「張木生旋風」。1969年他在一場沙龍辯論中預言，「當人民自覺起來的時候，我們的國家就會出現一個達芬奇的時代」，後來的改革開放，印證了這一說法。

20餘年一晃而過，張木生回想「達芬奇時代」，感慨萬分。他說，我們今天仍然要尋找我們的「達芬奇時代」。

雪夜無人讀禁書

問：北京的知青中間曾經颳過一陣「張木生旋風」，您的〈中國農民問題學習——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〉成為當時廣為流傳的手抄本，後來也給您惹來了牢獄之災。那種條件下，您怎麼可能旁徵博引、洋洋灑灑寫出幾萬字的文章？

註：本文係《南風窗》雜誌對張木生的採訪（〈尋找我們的「達芬奇時代」——對話張木生〉，《南風窗》半月刊2006·8上，第34~36頁）。

張木生（以下簡稱張）：我是「文革」前一年，1965年，和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下鄉插隊到了內蒙臨河縣狼山公社。陳曉農那時候在人大附中讀高中，是個好學生，本來是要選去深造培養接班人，但他父親要求他到農村鍛煉，我們就結伴下鄉了。

我們這一代人，讀書時代恰恰是在「文化大革命」。那時讀書和現在不一樣，現在讀書很大程度上有很功利的目的和很直接的行為動機，我們那會兒人年輕，也非常幼稚，功利性很弱。下鄉插隊，心裡想既然已經下來了，與其荒廢青春，還不如多讀一些書。所以，那時候的讀書氛圍很好，以後再也沒有那麼好好讀書了。在「文革」中受啟蒙，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特點。

很難想像，那個時候我、現在北大的教授李零，還有其他幾個人，我們在鄉下竟然有這樣大（手勢比劃）的木頭箱子，有六箱子書。

問：那些書都是從什麼渠道來的？

張：全部是自己家裡和大學圖書館的。那時候大學圖書館的牆已經打穿了，武鬥之後隨便進出。我們人大（中國人民大學）有一個很著名的教授，他家的書當時是兩間房子，書架一個摞一個，他下幹校之前要把書全部賣掉，誰出200塊錢就可以全部拿走。我們當時拿不出200塊錢，就到他家，說王老師您的書就別賣了。他說那你們看哪些書好，你們拿走，不要錢。我們就把尼采的《查拉斯圖拉如是說》那些書帶走了，帶到鄉下。

當時不像現在有這麼多書，那時候一本就是一本，而且一本書的讀書筆記比這本書還要厚。不僅把原文讀了，而且字裡行間沒有的意思也讀出來了。真是黃泥小屋，油燈一盞；天下第一快事，雪夜無人讀禁書。那個感覺再也找不到了。

問：那麼多書，都是去內蒙臨河的時候帶下去的嗎？

張：不是，當時書帶得很少，後來「文革」發生了，就像搬家一樣搬書，我們有一架非常古老的鋼琴也搬去了。先是從北京把鋼琴貨運到臨河，然後趕了架牛車去車站拉。那時候我們插隊的地方還有那種能一次攔12張唱片的留聲機，貝多芬1~9交響曲，包括後來流行的帕瓦洛蒂、外國民歌200首，我們一首沒落。

問：「文革」開始以後，你也跑回北京了吧？

張：剛開始的時候，「血統論」很盛行，我跑到清華大學批駁「血統論」。後來，我們準備到湖北紅安辦一個「半農半讀毛澤東思想講習所」，這個想法也得到了當時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支持。湖北屬於華南局，是陶鑄和王任重領導的，他倆在「文革」初期沒倒，後來發生了「一月風暴」，他們都垮了，我們的理想也沒實現。

1967年冬，我和李秋夢去了趟大寨參觀，想學點經驗。第二年春天回到內蒙臨河，還是想辦「講習所」，結果從春天折騰到秋天也沒鬧出什麼名堂。李秋夢覺得沒意思就回生產隊自薦當上了隊長，並試著推行小包乾、增加自留地、辦副業，沒想到竟使生產隊增產十幾萬斤糧食。這件事對我刺激很大，後來我就發奮讀書，寫出了〈中國農民問題學習〉。

問：您那時候埋頭讀書也有逃避現實的意思在裡面吧。

張：是啊。我心想，我父親是1931年浙江海寧第一個共產黨員，給周恩來、董必武都當過秘書，我母親是1936年的黨員，怎麼我變成出身不好的？我本來一個好好的家，怎麼老爹也鬥死了，老媽也關起來了，這是什麼世界？我當然有怨

氣了。於是就一邊種地，一邊好好看書，看書完全把那些事情隔絕了。我祇能從書裡得到愉悅，那時候收工往家走那一段也要把書翻出來讀，我是從初中文化一步一步讀出來的。

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講過

問：您那時候主要讀哪方面的書？

張：那時候讀的書太多了，我們因為比較關心國家的前途命運，所以側重於讀社會學、政治學的書。基本上，我們在插隊的地方，對照《辭海》，把一些門類的書都配全了。

對我影響很深的書，正面的像約翰·里德寫俄國革命的《震撼世界的十天》，梅林的《馬克思傳》，考茨基的《取得政權的道路》。托洛茨基的書在市面上是不可能買到的，但是「灰皮書」系列裡就有他的《斯大林評傳》、《托洛茨基回憶錄》、《論列寧》、《不斷革命論》，還包括《托洛茨基反動言論集》，這些書都給我留下挺深的印象。布哈林的書，《歲月》、《過渡時期的經濟》、《共產主義ABC》、《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》，還有盧森堡的《資本積累論》，巴蘭的《壟斷資本》、《葛蘭西文選》，以及後來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大家盧卡奇、馬爾庫塞的書也出了。還有布羅代爾的《資本主義動力》，安德森的《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》，本雅明的《莫斯科日記·柏林紀事》。

這些書譯得都很好，很多都是大家翻譯的，比如黑格爾的《美學》、《法哲學原理》。那時候周揚就說，北大的這幾個寶貝趕快用他們，不用的話，人很快就去了。

問：能得到、看到這麼多、這麼全的書，跟個人的家庭背景有關係吧？

張：當時有兩種人可以看到這些書，一種是黨內的知識分子，比如我母親，另外就是黨內的高級幹部，不管黃皮書、灰皮書、白皮書，都給你作一個參考，經常是大人不讀小孩讀，大人沒有時間啊。所以有那麼一個層面的人，他們手裡掌握了一批書。

我們插隊的時候，陳曉農也帶書，從他帶的書裡面你可以發現很奇怪的東西，他帶的都是延安版本，比如那時候他帶的毛主席的〈新民主主義論〉和後來發表在《毛澤東選集》上的不一樣。〈新民主主義論〉、〈論聯合政府〉，還有毛澤東親手改過的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〉（草案）——他們來回傳遞，毛澤東傳給彭真，彭真寫一大段，再給陳伯達，改了以後再傳回去。毛澤東的手稿，劉少奇的手稿都有，包括兩人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，原稿和後來收到《毛澤東思想萬歲》中的不一樣。

問：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後來不是作為手抄本流傳很廣嗎？

張：對啊，「文革」中翻出來作為黑幫言論批判！我們下鄉的時候還帶有《全國右派言論集》四卷本。當時不像現在要考試，就是大家看，大家評，大家聊。有這些書，看了之後，再看當時的現實情況，你會覺得眼前一亮，有很愉悅的感覺——終於把這個事情搞清楚了。

問：什麼書對您思想的成形有比較大的影響？

張：我第一次讀劉少奇 1962 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（包括毛澤東的不斷插話），眼前突然一亮，這確實是兩條路線的鬥爭。順著當時對劉少奇的批判，對照《哥達綱領批判》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的提法，《列寧全

集》25~33卷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學說和新經濟政策學說，馬克思和列寧所堅持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，是「三階段論」，而不是通常流行的由斯大林灌輸給我們的「兩階段論」。那時候，看明白了「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」的論述，我感到肉體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昇華同時出現了。

《全國右派言論集》對我們思想的衝擊也比較大。自由自在地讀書，東拉西扯地聊天，1968年〈中國農民問題學習〉就是這樣寫出來的。打倒「四人幫」後我到黨校學習一年，我當時的論文就是講：中國肯定要搞市場經濟，但是市場經濟並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，因為它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終追求，市場必然有「異化」——那篇論文是1978年寫的，到了1983年、1984年才有人提中國應該搞市場經濟。

1978年以後發生的所有爭論，在《全國右派言論集》和一些其它的右派言論集中都已經討論過了。許多問題現在還在爭來爭去，讓我們感到很奇怪。

問：您在〈中國農民問題學習〉裡面，反對學大寨，反對人民公社，提倡「三自一包」，那時候可沒有人敢說那些話。

張：那是一個五萬字的文章，是一封給朋友們的信，清理思想的信，它很快就變成一個手抄本，在知青中到處傳。當時胡耀邦把我找去，說我寫得好。那個東西其實沒有什麼我的話，都是書裡面讀來的。比如托洛茨基怎麼駁斯大林，斯大林又怎麼回答托洛茨基，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爭論，他們爭論的焦點，列寧是怎麼講的，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又是怎麼講的。

我在〈中國農民問題學習〉裡面把這些歷史現象一個一個講出來，然後得出一個結論：包產到戶確實可以增產。

問：你這封信影響太大了，後來還被人告到周恩來那裡。